

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演變：回顧與展望

林啟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從修好變成反目

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先後進入了近代世界歷史之中。兩國均同時面對如何從傳統的國際關係進入近代的國際關係的問題。中國和日本有一種華夷的世界觀（天朝上國），但日本藉明治維新而成功脫離舊體制，追求與西方國家同樣地位的民族主權國家。而中國雖經晚清洋務運動新政及一連串的改革，始終還未能放棄傳統的華夷秩序觀念，很遲才出現近代主權國家觀念。於是中日兩國的近代化步伐便不同，而中日的關係也因此而出現種種困難和問題。

近代西力的東漸，對中日兩國造成空前巨大的文化衝擊。由於對西方的不理解（兩次鴉戰都沒有下定決心開放國家，向西方列強效法），中國反而更加拘泥於保守原有世界觀和亞洲的秩序。日本則於培理叩關後，下定決心開國，向西方列強效法（明治維新五御誓文中有二條說：廣求知識於寰宇，以振皇基；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積極加入新世界秩序中，參與競爭。因此日本明治政府立國目標是要創造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態勢，使日本發展為足以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的近代主權國家。而中國的同光新政，還主要是修補國內的舊統治秩序，對列強採取羈縻之策，也不積極展開對西方諸強國的對等外交。日本要成為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國家，首先必須獲得與中國對等的地位。1871年日本派出使節到中國商訂《日清修好條規》，意味日本尋求與中國對等及睦鄰友好關係。然而，兩國日後環繞台灣、琉球、朝鮮三地的外交爭執，終於催生了兩國正面的軍事衝突，中日從此捲入互相敵對的鄰邦。

二、日本意圖建立霸權

19世紀70-90年代，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的糾紛與衝突，固然一方面基於中國要保護其傳統的東亞朝貢體制秩序不受損害，而日本要打破此一秩序而尋求與中國對等關係的建立，但更重要是反映了當時西方列強在遠東地區均勢的對壘與利益的角逐，英美兩強藉支持日本擴張，以牽制俄國在遠東的擴張，促成了日本的迅速發展強大。中國的清朝政府，首先對西化抗拒，延誤了改革的機會，其次更未能認清國際的新形勢變化，找錯了真正的戰略伙伴與對手。輕視日本，盲目親俄，疏遠英美。甲午之戰之敗，在未能認清日本早與英美結成戰略伙伴的關係。以為英美會因在華利益受損而干預日本發動侵朝戰爭。依賴俄國調停更起不了任何作用。俄國的意圖，其實欲藉日本侵朝機會，而南下瓜分滿洲。所以1895馬關條約簽訂、俄、德、法三國所關注者非朝鮮之被侵佔，乃遼東半島落入日方之手。戰後，俄國與中國關係更密切，而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擴張步伐亦加快，造成了日俄在遠東、滿洲地區之直接對峙，終於爆發日俄戰爭（1904-05）。

日俄戰爭對日本人的影響之巨，是中日甲午戰爭所無法比擬的。因為日本藉此進身西方列強之行列，黃色人種破天荒取得了對白色人種戰爭的勝利，英日在戰爭之前已結成同盟（壓抑俄國在遠東的擴張），戰爭之後，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實力對比基本上維持了均勢，此後日俄由戰爭對手變為合作伙伴，簽訂了四次密約，瓜分了滿蒙地區的權益，彼此承認對方的特殊地位，並合力對付第三國的介入滿蒙地區。

時隔不久，日俄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勢力均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俄國因革命而內戰，要退出中國的東北，中國發生辛亥革命，其後又有北洋軍閥割據。1914-18歐洲捲入世界第一次大戰之中，使日本有機會，有誘因實現其獨吞中國、獨霸亞洲的野心。於是日本便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款，進一步擴大在華的利益（前此不出滿蒙地區），此後兼及山東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利權。

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後不撤兵，招來英、法、美等國之疑忌，日本在中國及亞洲的大動作，終於招來列強的干預，1921-22華盛頓會議，及其後九國公約（重申中國門戶開放，各國均享中國權益）乃針對亞洲地區權益再調整與軍事力量的平衡考慮，用以壓抑日本的過度擴張。日本與西方列強的關係，從此由友善、默許到敵視、干預的發展。

三、從戰爭回到外交

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日本無疑已成為東亞地區的軍事強國，在一戰以後，日本獨霸亞洲的野心已經顯露，日本與西方列強的蜜月期亦已結束，此後，日本已視西方列強（英美俄）為其在中國及亞洲地區權益的最大競逐者和對手，日本為了要排除所有對手，把整個中國東北置於日本軍事統治之下，獨佔東北地區的資源以壯大本身的經濟，乃展開對華的積極外交，以鞏固其在東亞地區的超級地位。

十九世紀，日本對華政策奉行「聯英美制華」之策，又善用兩面手法，離間中俄親近。進入二十世紀，日本對華轉採獨立的外交路線，利用中國國內政治力量分裂與矛盾，從中漁利（先有滿漢政權之爭，後有袁孫之爭，再有直皖奉之爭）。但大體上，在1921-1927年，日本對華依循幣原喜重郎製訂的「幣原外交」路線。著重擴張經濟利權的守勢外交，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排日運動，通商條約的改訂，治外法權的廢除等，大都採取容忍態度。

幣原一再表示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對日本在華之「正當且重大的權益，」則表示不容受到威脅，尤其認定其在滿洲的利權，與日本生存有密切的關係。幣原對中國雖比較溫和，但仍視滿洲為其勢力範圍，力圖將東北剔除於中國領土之外，對滿洲的擴張視為日本基本目標。

而日本軍部態度尤為積極，多次干預中國的內戰與內政。如1924年直奉之戰，日本支持張作霖對抗直系。張有反日之意，即派人暗殺，其子張學良支持北伐統一，日本從中阻撓。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力主日本應確保對滿蒙的控制。

幣原外交雖表面上看似較為和平，但在處理二次直奉戰爭時，仍依恃軍事力量。無法避免實行雙重（二元）外交之矛盾，軍部強硬手段與幣原的外交手腕經常兼用。故有論者謂幣原與其後田中外交實質上並無分別。

幣原以態度軟弱，1927年下台，由田中義一取代。田中自兼外相，又重用外務次官森恪，森恪為一極端國粹主義者，主張積極開拓滿蒙權益。田中內閣雖表面支持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統一有效的政權，但當感受中國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時，又採用強硬手段，破壞中國的統一。1927年國民革命軍推進至濟南時，日本出兵阻撓，田中又主持東方會議，制定對滿蒙的積極政策。東方會議於1927年7月召開，對外發表《對華政策綱領》，決心維護日本在滿蒙的權益，明確宣示滿蒙分離政策。同年7月底《田中奏摺》被洩露，日本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國的步驟昭然若揭，雖有學者指《奏摺》是中國人偽造，以打擊日本，但日本其後的侵略部署，卻一一印證了《田中奏摺》構思與策略。

田中對華外交的基本方針乃是承認國民黨統治中國，但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華條約上的既得權益，滿蒙則應排除在中國之外，即支持張作霖地方政權，以維護日本利權。但這種滿洲分離政策，仍不為激進的關東軍所支持。1928年張作霖被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大佐謀炸死後，又改為支持張學良，但仍未能成功。田中的外交思想，仍然以國際協調為前提，不像軍部，專為將來的世界戰爭綢繆。籌劃國家總動員體制。

雖然幣原與田中都有具體的構想，均致力遵循國際政治的秩序，前者標榜中日之共存共榮，後者提倡積極外交，但都不免於失敗。

軍部高唱國防優先思想，主張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舉國上下亦瀰漫軍國主義思潮，九一八事變的發動即為此一思潮的試金石。

四、重返戰爭之路

九一八事變可說是由於日本外交行動之挫折，轉而確立軍事，國防優先思想的契機。軍事優先思想是以國防為主要國策，其他各項政策均處於從屬地位。視世界可分為數個大集團，在分化的過程中，超大國的爭霸戰

是不可避免且是必然的。故要厚儲資源，將其他競爭對手排除於本國支配的區域之外。以此國防觀念出發，日本認為「滿蒙正是日本發展霸權國地位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從而使日本的「滿蒙侵佔行動」成為合理化和合法化。日本侵佔滿洲是此一新國防觀念的產物，也是基於其戰略上的考慮。

日本的假想敵有二：即美俄兩國，尤以俄國為最。日本推行的「滿蒙特殊化」及「滿蒙獨立運動」除經濟因素外，實為基於抗俄的戰略考慮。尤其蘇聯在共產黨當政以後，對中日等國均造成「意識形態與戰略上的威脅」。田中義一之所以極度重視滿蒙，除了經濟因素之外，主要的乃在以之作為對抗蘇共的戰略基地。關東軍的戰略思想，乃以蘇俄為目標。及至共產主義滲透中國日甚，赤化危險日深，滿洲在對蘇的戰略上的價值乃愈顯重要。關東軍遂認為有佔領北滿的必要（北滿原來視為俄國的勢力範圍），蓋此不僅可以解決日本北方的國防問題，同時又毫無阻礙地可向南發展。滿蒙為日本戰略上的要地，且為統治朝鮮，支配中國的根據地。佔有滿蒙，即可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而其豐富的資源亦為日本所必需。日本如能完全控制滿洲，則可阻撓蘇俄之東進。發動九一八事變，其目的為達此戰略目標。

1929年起世界經濟大恐慌，西方列強多自顧不暇，蘇聯又在五年計劃期間，尚無強大阻遏力量，日本遂能有機可乘。

華盛頓會議（1921-22年）結束，英日同盟廢止，九國公約成立，英美日三國海軍主力艦訂為五、五、三之比，但默認日本在滿蒙有特殊權益。華盛頓會議雖重申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不干涉中國內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似有遏抑日本獨霸中國的圖謀，但同時使英美對西太平洋多島不設防，使日本海權在遠東地區得以進一步伸張。

1930年經濟不景，對美國打擊最大，工業生產銳減，失業人口驟增，社會經濟陷於混亂，使美國保守孤立主義再度抬頭。英國本身軍事力量亦迅速衰退，不能採取強硬政策。英美又寄望日本在滿洲維持支配地位可有效制止蘇俄共產主義擴張。視日本的滿洲行動為建一反共防波堤。誠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 L. Stimson）評調：「日本侵略滿洲，考慮避免受世界干涉所擬計劃，的確是最好時機。」英國當時外交界所採取的是「不顧犧牲多大，亦將儘量不介入」態度。英國充其量只能消極反日，本質上是被動的。無論英國或美國，都不願過分壓制日本，激起日本的反感。俄國的態度是日本所要重視。俄在北滿有巨大利益，1930年代，俄對北滿貿易仍居最重要的地位，加以1928-32年進行第一次五年計劃，滿蒙邊境軍力增強。日本關東軍憂慮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再推第二個（1932-1936）時，工業將更強大，構成對日本在東北最大的威脅，故必須先下手為強。中國當日正要應付國內軍閥混戰及中共崛起，蔣介石政府堅決執行「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命東北軍奉行不抵抗政策。

總之，無論是中蘇英美等國，都因埋頭於本身的問題，沒有在東北採取軍事行動的餘力，日本乃能乘機挑起九·一八事變，迅速佔據全個滿洲。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迅速以武力吞佔東北全境，並唆使清廢帝溥儀成立偽滿洲國，作為日本關東軍的傀儡，從而引起西方列強高度的關注，1931年12月國聯成立李頓（Victor A. G. R. Lytton）調查團。1932年10月公布報告書，不承認日本搞的滿洲國，日本代表憤然退席，並於1933年退出國聯。

1932年5月15日日本發生軍人政變，刺殺犬養毅，由軍人組織內閣。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將校發動政變，暗殺財相，佔領首相官邸及東京市中心區要求成立軍事政權。

日本經此數事，軍人勢力完全控制政府，實行法西斯統治，終於爆發七七事變，珍珠港事件，中日全面戰爭開始，二次大戰亦揭起序幕。

五、日本推行大陸擴張政策的原因

侵略滿蒙，進而兼併整個亞洲大陸，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制定的大陸政策的最大目標。日本的大陸政策經兩次對外戰爭——甲午、日俄而得以落實，所採者為西進政策，至九·一八事變達到高峰，此後一直到偷襲珍珠港，日本大陸政策轉為東進或南進為主。

自1907年，日本制定《帝國國防方針》以來，日本頗長的一段時間以俄國為其陸上的假想敵，而以美國為其海上的假想敵。大抵在1922年以前，日本的重點在防俄制俄，因此目標在對中國東北控制。九一八事變及其後偽滿洲國成立，日本此一目標基本上完成。日本國防策略在1922年以後轉移重點在海上擴張，與英美爭霸於太平洋（受軍縮條約壓抑後的反撥），發動七七事變是日本南進政策的必然一步，此後要全面控制中國的沿海地區，以確保向東南亞擴張不受威脅與牽制。1941年發動偷襲珍珠港乃其執行東進與爭霸太平洋的戰略部署。

1945年大戰告終，日本戰前的國際定位與國家發展的策略受到嚴峻的挫敗，其向亞洲諸國推銷的大東亞共榮圈的藍圖亦歸於破滅。

日本在1894-1945年間對中國公然發動多次的侵略戰爭，除了為爭取建立與西方對等地位的民族主權國家，進而參與西方國家殖民主義擴張活動，以謀藉此得到列強的承認，也因為其他種種複雜的因素造成的。

- (1) 19世紀列強在亞洲的角逐，日本成為對峙各方爭奪的棋子，受列強扶掖，日本逐漸形成大國夢。
- (2) 20世紀亞洲地區權力均衡（英俄對壘）破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演變成英德對壘，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滿清政權瓦解，民初軍閥混戰等，國際間兩極霸權尚未形成，加以1929年來經濟大蕭條，都予日本可乘之機，以進一步發展其「大東亞共榮圈」（聯黃抗白）的霸權國之夢。
- (3) 分裂衰弱的中國，擁有著豐富資源的土地，是令日本垂涎和敢於冒險奪取的重要誘因。
- (4) 日本傳統以來的大陸擴張思想到近代轉型為大亞洲主義思想（大陸雄飛論、興亞論）。
- (5) 日本的政治結構、軍人不受政府約束、直接受命於天皇指揮。日本軍人多有軍國主義（以武力控制國家、征服敵人）思想。而日本軍閥鼻祖山縣有朋在國防建設上，有著名的「生命線」和「利益線」的鼓吹。

六、戰後中日關係的改善

戰後，美蘇兩極形成均勢，冷戰開始。西方列強陣營重組。中日兩國分別受時勢所迫而加入對立的陣營，不能貫徹獨立自主外交路線。中日睦鄰友好關係無法建立，中日敵對的局面仍未結束。

到了1971年有了重大的轉機。同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田中訪華後，中日復交，中日發表聯合聲明，尋求結束對抗關係、建立永久和平條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第三國在亞洲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兩國不以武力解決爭端，中國更表明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為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直至1989年，中日關係之友好程度，是近代以來最好的階段。

七、二十一世紀中日關係展望

踏入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不再是與世界其他各部分相對隔絕的地域，而是與整個世界緊密一體化了，不能僅靠當事國以決定東亞地區諸國的命運。中日兩國將憑本事實力的互補性，成為東亞地區的基軸。不同於傳統上以中國為核心的夷夏秩序，又不同於十九、二十世紀以日本為核心的大東亞秩序，更不是戰後的冷戰隔斷局面，開始可以建立中日兩國真正平等關係。中國以政治、軍事大國，日本以經濟大國出現，將可發揮互補互利的優勢。中日及周邊國家的經濟實力將十分巨大，其世界市場佔有率將可與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匹敵。中國、日本、韓國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的東亞貿易自由圈，將可與北美及歐盟兩大貿易圈鼎足而三，成為推動新世紀經濟和政治合作的基石。中國行為方式將對國際社會投下更大的影響力，日本的任務在於認清這必將產生的變化，採取理智行為，維持與中、美兩國的良好關係。尤其應力促中美兩國建立互信和合作的關係。日本的惡夢將是中美兩國的紛爭。日本安全及國家利益，乃至世界利益，都有賴於中美兩國關係的穩定與友好。

【研究札記】

孫中山先生幼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號逸仙。孫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為保行動秘密，除原名、字、號以外，還有許多化名、筆名，生前死後還有銜稱和尊稱。據余齊昭在〈孫中山的名號〉¹一文中歸納，按時間順序大致可作以下排列：

一、名字、別號

(1) 德明、(2) 帝象、(3) 帝朱、(4) 文、(5) 日新、(6) 逸仙、(7) 中山樵、(8) 載之

二、化名

(1) 陳文、(2) 林行仙、(3) 興公、(4) 高野長雄、(5) 吳仲、(6) 山月、(7) 中山二郎、(8) 杜嘉偌
(9) 武公、(10) 高達生、(11) 李竹癡、(12) 東山、(12) Dokans. Dr. Alaha、(14) 啊羅哈

三、筆名

(1) 中原逐鹿士、(2) 南洋小學生

在李曉生所遺的文件中，存有一段似乎尚未完成的自傳性文字。其中特別提到，辛亥年孫中山先生從紐約抵達倫敦時，曾化名Mr. Takayama下榻Savoy旅館：

余於前清光緒十五年戊子二月廿五日（即西歷一八八八年四月六日星期五）生於星洲。六歲返國入塾。十歲丁父憂。十六歲回星洲習賈兼學英文間嘗瀏覽當時革命黨人之出版物（如民報、新世紀、中國報等），排滿之念油然而生。對於革命事業心篤向往。一九〇六年余年十八歲適孫中山先生駕臨星洲，余由李鏡仁先生介紹謁孫先生於晚晴園。即日加入同盟會，其時星洲總支部設於晚晴園。剛始成立會員僅得十九人。余年最少。陳楚楠、張永福兩君分任正副會長。余被推為通信員。一九〇七年十九歲改任總支部書記。是年汪精衛、黃克強、張溥泉、胡漢民、胡毅生、田梓琴、鄧慕韓、張西林諸先生次第南來分赴各埠從事宣傳。余被派返粵工作，持胡、汪兩先生介紹函訪朱執信先生於法政學校。一九〇八年春間復回星洲，被推任總支部總幹事。兼任主盟人時星洲會員已增至二百餘人。各外埠支部已次第成立。會務比前較繁。余每日赴總支部工作，常在孫、胡、汪諸先生左右暢聆教養至感興奮。又屢承胡、汪兩先生勸勉，遂決意自費赴英留學，冀將來所學有成為革命效力。即於一九一〇年（廿二歲）由港乘日本郵船赴英。孫、胡兩先生各給介紹函訪吳稚暉先生於倫敦。謬承厚待視同子侄。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攷入倫敦大學之波德斯學院習化學。上課未幾，報載武昌舉義各省響應。余正以身在外國，未由參加舉義為憾。乃孫先生適於是時由美抵英。同來者有朱卓文先生及美國人「堪麻李」將軍夫婦，住在Strand之Savoy Hotel。孫先生化名為Mr. Takayama擬在歐稍留分訪英法政府當局，然後赴馬賽乘船返國并邀余隨行。未赴法前留英數日亦有足記者數事……

計開

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魏仁同、魏譚同、吳悟叟、林鏡秋、鄧子瑜、黃耀廷、許雪秋、鄭聘廷²、李鏡仁、李渭川、謝心准、張振東、何心田、陳開國、林航葦、謝儀仲、李曉生。

李曉生（1888年-1970年），廣東番禺人。一九〇六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³一九一〇年赴英。⁴一九一一年，張靜江與吳稚暉等人發起留英儉學會。李曉生在倫敦與吳稚暉及其子女擔任儉學會之招待者。⁵同年十月，武昌革命成功，國內紛電孫中山返國。孫中山由美至倫敦。當時在倫敦的李曉生與吳稚暉代孫中山處理函電。⁶隨後孫中山邀李曉生一起回國。李曉生伴隨孫中山從倫敦起程，前往巴黎、馬賽、新加坡、香港、上海至南京。⁷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南京，李曉生時任總統府秘書。⁸

李曉生上述文件中所提到的Takayama顯然是日本姓氏。日文意為“高山”。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化名Nakayama不足為奇。Nakayama的日文意思即是“中山”。現有文獻中似乎未見有孫中山化名“高山”的記載。

若李曉生文中“Takayama”不是“Nakayama”之筆誤（參見手稿掃描件），“高山”（Takayama）很可能是孫中山只用過一次、或者是不常使用的化名。

在“Homer Lea,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書中，Eugene Anshel 提供了一份當時寄往Savoy，由Homer Lea（堪麻李）收的電報。其收件人格式為：HOMER LEA SAVOY LONDON。⁹從中看出，若孫中山以Mr. Takayama 化名住在Savoy旅館，名義上的收發報人只能是Mr. Takayama。然而，其中一點疑竇是，在當時電報來往頻繁的非常時期，中外人士又如何與使用化名，特別是使用新化名的孫中山保持聯繫？

實情是否如此，請行家研究。

鳴謝：本文在李耐宜、李舒珊兩前輩的悉心指導下完成，謹此致謝。

《當代史學》編者按：李紓〈辛亥年孫中山在倫敦化名攷〉一文，收錄李曉生所遺文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可供研究參考。從手稿掃描件所見，並不如李紓所說「孫先生化名為Mr. Takayama」（日人姓氏「高山」之意）。原件作Mr. Lakayama，與孫中山先生的化名「中山」（Nakayama）相近，可能是對「中山」的日文讀音出現偏差，而寫成Lakayama。抑或另有別情，仍待進一步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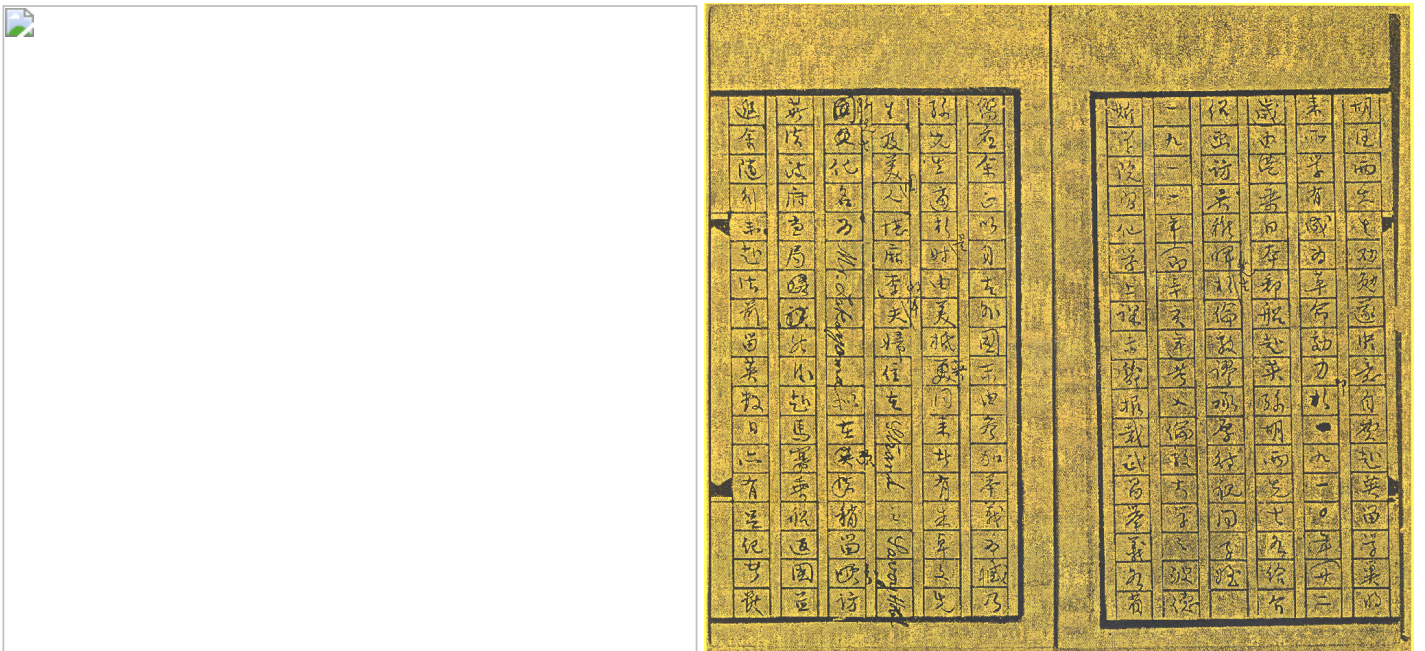




插圖 李曉生手稿掃描件

1. 余齊昭著《孫中山文史圖片攷釋》（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9），頁317-323。
2. 原文在許雪秋（許梅）和李鏡仁之間原載有鄭聘廷，以後不知是什麼原因又被圈劃掉。
3.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三），中國同盟會（台北：正中書局，1964），頁522。
4. 據陳洪、陳凌海編撰《吳稚暉先生大傳》頁58記載：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日，（吳稚暉先生）女公子芙正式肄業「旁」校（譯音）。李曉生進「留」校（譯音）就讀。
5. 陳三井校訂《旅歐教育運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58-59。
6. 李書華〈辛亥革命前後的李石曾先生〉，見《傳記文學》，1974年，第24卷第2期，頁42-46。
7. 同注3，頁550。
8. 李紓〈孫中山一九一二年四月致李曉生函時間攷〉，見《東南學術》，2001年，第5期，頁115-116。
9. Eugene Anshel, *Homer Lea,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159-160.

【新書介紹】

閱讀香港之一：新世紀出版香港專題史五種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1997年前後，香港研究曾經盛極一時，有關著作如雨後春筍，在海內外都備受注意。回歸以來，“香港熱”似乎有冷卻之勢，外地人士對香港的興趣漸減，出版界亦因經濟低迷而處於沉寂狀態。幸而二十一世紀開展之初，香港話題再現生機，趁熱鬧的人少了，有心人仍在孜孜不倦。

以下介紹的五種新書，都是2001年和2002年出版的，內容從供水到供電，既有深入探討道教文化，也有淺嚐土風舞歷史，以及集眾人成果於一冊的論文集。所反映出來的共通之處，就是大家都致力於專題史，與二十世紀

末葉競相編寫概說書的現象比較，算是向前走了一步。

希望「閱讀香港」這個題材可以繼續下去，但大前提是有更多值得介紹的好書。這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努力可以達到的，關鍵在於香港這個地方究竟有多少意義！

(1) 何佩然著《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250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水務署為紀念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何佩然博士進行香港水務發展史的研究，撰成此書，介紹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結束為止本地的供水歷史。

此書分為三部份：

上篇〈淡水資源的開墾（1840-1899）〉——敘述香港供水歷史的第一個階段，內容包括：（一）沙漠興舟；（二）壓力變動力；（三）創造水源；（四）開源節流；（五）世紀浩劫——瘟疫；（六）小結。其主題是探索政府竭力承擔公共供水服務的原因，以及了解早期尋找淡水資源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中篇〈供水系統制度化（1900-1945）〉——敘述香港供水歷史的第二個階段，內容包括：（一）拓展契機；（二）世紀新建設；（三）質量兼備；（四）望天打卦；（五）戰亂求生；（六）小結。研究課題包括政府積極改善食水質素，加強供水系統管理，以及供水系統制度化與香港都市化的關係等。

下篇〈穩定的食水供應（1946-2000）〉——敘述香港供水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內容包括：（一）重建家園；（二）大型建設；（三）涓滴全無；（四）海水資源運用；（五）悠悠東江水；（六）小結。研究課題包括大規模供水工程的興建，開發新的水資源，以及供水系統的發展對香港經濟轉型的影響等。

書末還有〈總結〉、〈後記〉及香港供水大事紀要、參考書目等，結構完整。作者在〈後記〉中指出：「香港供水歷史，不單是水務署發展的歷史，也是香港社會都市化的寫照。」水的問題與香港社會民生關係至大，所以此書可說是香港史研究的重要參考。

(2) 郭少棠著《光耀百年》，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2001年。（238頁）〔Kwok Siu-tong, *A Century of Light, Hong Kong: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2001. (238pp.)*〕

本書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郭少棠為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簡稱中電）慶祝創立一百年而撰寫的，描繪了中電發展的歷史圖像。正如作者在題為〈光耀百年——社區的集體記憶〉的序言中指出：中電「從艱苦的草創時期，默默地成長，終於成功地發展為一間深具良知的公共事業機構。它協助九龍和新界走進一個電氣化的新階段，替這十四個社區的進步奠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

全書分為三部份：

第一篇〈電力社區齊起步（1901-1905）〉——內容包括：一、電力發展謀草創（1901—1917）；二、結構重整耀光輝（1918—1930）；三、新界通電啟開端（1931—1941）；四、戰雲密佈覓能源（1941—1945）。

第二篇〈能源城市共開展（1945-1982）〉——包括〈都市社區電氣化〉和〈電力社區現代化〉兩章，介紹九龍的油尖旺、深水灣、九龍城、黃大仙、觀塘五個社區，和新界的荃灣、葵青、屯門、元朗、北區、大埔、沙田、西貢、離島九個社區。

第三篇〈社區光輝耀百年（1982-2001）〉——包括〈能源飛躍新紀元〉和〈光耀百年照社區〉兩章，介紹近二十年來中電的發展。書末附有索引及參考資料等。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米高·嘉道理（Michael D. Kadoorie）在本書的〈前言〉中說：「郭教授在本特刊的論述中最突出的主題，或許就是中電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中電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鍾士元的〈導言〉亦強調，此書「從新的角度透視中電及香港社會一百年來的成就」，並且指出「中電對香港的最大貢獻，相信是為戰後蓬勃發展的製造業供應充足而可靠的電力。」

《光耀百年》由鄭景恆譯成英文，全書中、英文對照，選錄大量黑白和彩色圖片，彌足珍貴。總的來說，此書以中電一百年來的歷史為脈絡，反映出香港社會的變遷和成就，關心香港史的讀者應該一讀。

(3) 游子安主編《道風百年——香港道教與道觀》，香港：蓬瀛仙館道教文化資料庫、利文出版社聯合出版，2002年。(317頁)

本書探討近百年來香港道教的歷史進程和介紹香港地區的道觀概況，對本地道教與中國道教的關係亦有所論述。作者訪問了五十八家道堂宮觀，以實地採訪為基礎，再參考道堂書刊，撰成此書，是現時有關方面最詳盡且有系統的著作，正如主編游子安在〈編後語〉中指出：「藉《道風百年》畫冊的出版，回顧鑪峰百載道教的發展，使人對香港道教的歷史和地位，有較豐富而全面的認識。」

本書分為兩部份：

上篇〈香海流雲——香港道教的源、流、變〉——由游子安執筆，總論香港道教的發展，突顯香港道教對中國文化傳播的作用以及對香港社會的貢獻，共有五章：第一章〈承先啟後，薪火相傳〉，追溯粵港澳道脈源流；第二章〈多神崇拜，融入民間〉，記錄香港道教信仰實態；第三章〈博施濟眾，興學育才〉，闡明道堂善業與香港社會；第四章〈弘道闡教，文藝薈萃〉，探索香港道教文化和藝術；第五章〈道風流播，百載增輝〉，敘述香港道教聯合會的成立及中港道教界的互訪交流等。

下篇〈仙蹤道跡——香港道教宮觀巡禮〉——由鍾潔雄、危丁明撰寫，按時序介紹四十三間具代表性的香港道堂，包括其創辦歷史、發展經過和現狀，說明其道脈源流和弘道特點，例如萬佛堂、天真堂、桃源洞、藏霞精舍、齋色園、抱道堂、竹隱長春洞等。

今日道教在香港已不只是一種傳統信仰，亦為香港許多社會服務的承擔者和支持者。此書圖文並茂，收錄大量有關照片，頗能反映道教的各個方面，同時也是記錄香港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著作。

(4) 梁成安著《香港土風舞歷史——一本屬於全香港土風舞界的書》，香港：中華書局（發行），2002年。(175頁)

本書是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的計劃，繼《香港舞蹈史》（2001年出版）之後的另一成果。作者梁成安博士是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是業餘的土風舞愛好者，他在本書的〈序言〉中說：「出版這本書是對本人一個挑戰，因為本人並未有嚴格的歷史學術研究經驗，而很多資料來源都是來自業餘愛好者的口述及記錄。」亦正如作者指出，《香港土風舞歷史》「是一個未完的故事」，例如有關校際舞蹈節及香港公開舞蹈比賽等，都有待更多的補充。無論如何，此書為香港土風舞歷史譜寫了藍圖，提供和保留了若干珍貴資料，是很有意義的。

全書共有五章，第一章為總論，第二至五章分別探討以下四個發展階段：

(一) 1967年以前——計有社會背景、華革會、郭世毅、音教會、施明、教育學院、蔡濟淮、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何烈基先生（Rickey Holden）、方圓社、香港學校舞蹈節校際舞蹈比賽、香港大學及小結十三節。

(二) 1967年至1979年——包括社會背景、成人教育康樂中心、康體處、呂鈞洪、蓓蕾社（創社時代）、舞蹈及音樂服務社（DMS）及曾小星、李玉冰、社團、青風、旋藝社、翔之社、其他社團、同樂會及小結十四節。

(三) 1979年至1986年——分為社會背景、蓓蕾（聖匠時代）、郭緒強先生、中文大學、聯校土風舞學會（Joint School Folk Dance Society）、蘇格蘭舞、國際土風舞學會（I. F. A.）、荃灣舞蹈促進委員會、民風社、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會（Imperial Society of Teacher Dancing ISTD）、同樂會及小結十二節。

(四) 1986年至現在——分為社會背景、蓓蕾舞蹈社（美孚時代）、劉定國、馮杏美、李光華、香港大學、楊君儒、索意西方民族舞蹈團（前身為九龍城西方民族舞蹈團）、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香港土風舞總會（Folkdanc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旭穎西方土風舞蹈團、舞之集、何志雄、鄧愛儀、樂苗社、盈風、舞飄、臻青、飄躍社（Caper Folk Dance Group）、樂舞者、梁綺霞、青春樂、香港土風舞聯會、香港人到海外土風舞研習營、全港公開舞蹈比賽及舞蹈博覽、香港學界舞蹈協會、香港舞及小結二十八節。

書末還有十個附錄，依次為：（1）港九音樂教育研究會；（2）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簡史；（3）翩翩二十年——楊子潔：校際舞蹈節歷史；（4）呂鈞洪先生曾教授的土風舞班及課程；（5）蓓蕾舞蹈社年曆；（6）1977年9月刊登於《香港土風舞》之「港九新界土風舞例會時間表」；（7）外國導師在香港教授土風舞的紀錄；（8）旭穎歷年創作及活動；（9）「小亞營」歷屆授舞導師和舞蹈記錄；（10）1996至2000之Top 100記錄。

(5) 劉義章、黃文江合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年。(210頁)

本書是一群曾肄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學者，為了感激吳倫霓霞教授的教誨，在吳倫教授榮休之時，呈獻給老師的論文結集。吳倫教授是香港史專家，此書收錄的論文，全部圍繞著香港史這一課題，可見她在培養人才方面的功勞。

書首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院長黃鈞堯教授的前言，和劉廣京教授、王賡武教授兩位著名歷史學家所寫的序，內容大抵指出吳倫霓霞教授的學術成就，以及此書的意義。主編劉義章、黃文江的〈導言〉，對書中各文有扼要的介紹。收錄論文九篇，分為三組：

(一) 吳志華〈由“防罪”到“防暴”：香港警隊中印籍警察角色的演變〉、陳宇山〈十九世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一場宗教小風波：“薩默事件”和“凱帕爾事件”〉和黃文江〈十九世紀香港西人群體研究：偷寧堂的演變〉三篇，是探討香港非華裔族群社會及分析西方文化內部衝突之作。

(二) 趙雨樂〈二十世紀上半葉粵港文人的雅集與交游：讀黃詠雱《天蠶樓詩文集》〉、李光雄〈近代村儒社會職能的演變：翁仕朝的教育和醫療事業〉、高橋李玉香〈“日劇”在香港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三篇，均著眼於文化問題，分別討論香港上層文人和村儒在發揚傳統文化學術方面的努力，及分析二十世紀下半葉在香港盛極一時的日本潮流文化。

(三) 劉義章〈宣傳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梁家麟〈五十年代宣傳會在調景嶺的工作〉、邢福增〈“基督教新村”的社會服務工作：五、六十年代香港衛理公會的個案研究〉三篇，集中討論基督教發展和宣教士活動。

最後，黃文江、劉義章〈香港史開拓者：吳倫霓霞的教研工作〉，記述了吳倫教授的學術歷程，並以她對於香港史發展方向的意見作結。本書的九位作者，大多擔任教職，包括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黃文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陳宇山（聖言中學）、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高橋李玉香（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梁家麟（建道神學院）、邢福增（同上）諸位；另外，吳志華任職於古物古蹟辦事處，李光雄任職中央圖書館。各人都有自己的崗位，而都在不同方面致力於香港歷史文化的推動。

總的來說，這是一冊充滿學術感情的著作，王賡武教授在序中已予指出，吳倫霓霞教授指導的學生真能“把香港史的視野延伸到更廣闊的境界去。”劉廣京教授在序中強調：“際茲政治與文化不能脫離關係，而歷史現實不可分割之情勢下，本論文集之出版尤其有重要意義。”作為史學界的一份子，翻開此書時的心情，正如黃鈞堯教授在〈前言〉中說：“能目睹她於榮休之時從門生手上接過這份獻禮，內心為她感到無限歡悅。”

【新書介紹】

郭振鐸、張笑梅主編《越南通史》評介

郭振鐸、張笑梅主編《越南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677頁)

本書闡述越南自遠古時代至十九世紀末葉總共二千餘年的歷史，是現時中文著作中最新而且內容較為詳細的一種。全書分為五編，共有十五章，內容如下：

第一編為“總論”，共有兩章。第一章討論越南通史的基本線索和歷史分期，第二章介紹越南的自然環境、自然資源、民族、風俗、文字、首都和國名沿革。

第二編為“原始社會和秦漢時期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亦有兩章。第三章記載越南原始公社時期或傳說時期的社會，第四章敘述秦漢時期的南越和置象、交趾等郡。

第三編為“越南封建社會前期”，包括第五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國諸封建王朝治下的交州和林邑國的關係〉，第六章〈隋唐時代安南封建社會的初期發展與林邑國的關係〉，第七章〈安南土豪乘五代十國變亂

之機建立地方性封建割據政權之始)。

第四編為“越南獨立封建國家的創建”，計有四章。第八章記敘丁朝和前黎朝的建立及其封建中央集權制獨立國家的產生和鞏固，第九章論述李氏王朝統治下安南封建社會的持續發展，第十章描寫越南陳朝時封建社會的鼎盛，第十一章探討胡朝的興衰和屬明時期。

第五編為“越南封建社會後期”，亦有四章。第十二章〈後黎朝的創建、興盛和衰亡〉，第十三章〈西山農民起義和西山阮氏王朝〉，第十四章〈越南阮氏王朝的興衰〉，第十五章〈越南諸封建王朝對鄰國的蠶食和侵佔〉。書末附錄大事年表、越南歷代紀元表、主要參考文獻，方便參考。

本書也有若干不足之處，首先是以十九世紀末葉作為敘述的下限，沒有交代一個世紀以來越南的巨變；其次是書中十分注重中越兩國的歷史交往，對於越南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則著墨較少；此外，參考文獻以史料和古代著作為主，近人研究卻付闕如，而且只限於中文和越南文，沒有列入法文、英文、日文資料。

本書的編著者在〈前言〉中說：“欲闡明越南諸封建王朝的歷史，既有浩瀚而確鑿的中國古籍名著可供我們參閱，又有大量用漢文撰的越南史書可供我們覓尋它的端倪，所以我們中國學者研究南史不僅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而且有義不容辭的職責。”〈後記〉中一再強調：“作為中國史學工作者有責任也有必要重新審視二千餘年的越南史和中越關係，寫出一部有一定特色的越南通史。”越南是中國重要鄰邦之一，以中越關係密切的程度，我們實在需要一冊有份量的越南通史，希望今後本書再版時，能夠增加近現代史部分，內容和觀點方面並作相應的擴大和補充。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學界動向】

「21世紀世界與中國」學術研討會 ——歷史文化、國學研究、中美關係簡介

香港浸會大學——北京清華大學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已於2002年5月22日至25日在浸大舉行，本屆的主題是「21世紀世界與中國——當代中國發展熱點問題」，其中屬於歷史文化部分的小組，並有十一個，學者及宣讀論文如下：

一、 歷史與文化探討

◎ 歷史與文化（一）

主席：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蔡樂蘇、金富軍（清華大學歷史系）「話語轉移與民族振興：以五四時期杜亞泉的“動”“靜”觀念為中心分析」

張勇、王勇（清華大學歷史系）「試論張之洞幕府改革與晚清政治文化發展及其對當代的啟示」

呂紹理（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台灣與中國在萬國（世界）博覽會中的自我呈顯」

評論：周昌龍（台灣暨南大學中文系）、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 歷史與文化（二）

主席：馬幼垣（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艾四林（清華大學哲學系）「經濟全球化中民族文化的發展」

彭南生（浸大歷史系訪問學人）「包買主制與近代鄉村手工業的發展」

Wayne Patters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t. Norbert College), “William Nelson Lovatt Dismissed from Office: Maritime Customs and Sino-Korean Relations, 1880–1886”

Li Mingwei (北京行政學院歷史教研部), "Introjection of Civilizations: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Discussants: Lee Pui Tak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Chung Po Y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HKBU)

二、 國學研究專題

◎ 國學大師研究 (一)

主席：葛兆光 (浸大中文系訪問學人)

單周堯 (香港大學中文系) 「論王國維」

李學銘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論王國維先生的屈子情懷」

許子濱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王國維之禮學」

陳致 (浸大中文系) 「從王國維〈北伯鼎跋〉看周初“邶入於燕”的史事」

林錦源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陳淑玲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 「吳金鼎 (1901-1948) 在中國史前考古學上的貢獻」

評論：黃嫣梨 (浸大歷史系)、李山 (浸大持續進修學院)

◎ 國學大師研究 (二)

主席：蘇維初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李天綱 (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中心) 「“文藝復興”還是“新文化”：梁啟超與清末民初“史學革命”」

周佳榮 (浸大歷史系) 「從西學到國學：梁啟超與清華國學研究院」

劉龍心 (東吳大學歷史系) 「梁啟超與近代目錄學研究」

周昌龍 (台灣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 「章太炎與近代儒學的調適與發展」

屈大成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湯用彤的佛教觀」

評論：余炎光 (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林啟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梁萬如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 國學研究的開展 (一)

主席：Ming K.Chan (Hoover Research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Tse-ki H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From Harvard to Dongnan: Wu Mi's Interpretation of New Humanism"

Henry Y.S. Chan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The Appreciation of a Masterpiece: Reviews of Zhang Yinlin's *Zhongguo shigang* in the Last Sixty Years"

Lauren Pfister (Dept.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Construction and Remodell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Feng Youlan's Four Histor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Discussant: Mak King-s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HKBU), Tai-wai Wan (General Educatio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國學研究的開展 (二)

主席：朱益宜 (浸大歷史系)

馮錦榮 (香港大學中文系) 「關於陳寅恪先生對年代學的認識——兼論繆勒教授 (Professor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uller, 1863-1930) 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

李玉梅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陳寅恪 (1890-1960) 思想的後現代主義色彩」

區志堅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 「陳寅恪與羅香林的師承關係：以民族問題為主的討論」

李金強、文兆堅 (浸大歷史系) 「當代香港華文史學之興起——錢穆與新亞書院為個案」

評論：李天綱 (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中心)、張偉保 (新亞研究所)

三、中美關係專題

◎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Vastly Changed World (I)*

Chair: Danny S.L. Paa (Department of History, HKBU)

Julia Chang Bloch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US-China Policy: A New Realism Aileen Baviera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ost-Cold War Strategic Interests of China and ASEAN: The Role of the US

Priscilla Robert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ging US Perceptions of China, David Bruce to the Present

Discussant: Alexander Lukin (Russia)

◎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Vastly Changed World (II)*

Chair: Julia Chang Bloch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Alexander Lukin (Russia), Russian-US Rapprochement and Russia-Chinese Relations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Gerald Cha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New Zealand), China's WTO Compliance: Implications for Sino-U.S. Relations

Yu Hongyuan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Chen Yue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China-US Nonproliferation Co-operation
Discussant: Ming K. Chan (Hoover Research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 *Perennial Problems in Sino-US Relations*

Chair: Ian Storey (Deakin University)

Herbert Ye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China Threat' Factor in Sino-US Relations

Gilbert F. Ch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S Threat'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in Sino-US Relations

Harry Lo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ino-US Trade Relations: Assumptions, Assertions and Arguments vs Realities

Danny Paau (Department of History, HKBU), Perennial Problems in Sino-US Relations: In Search of Alternative Attitudes, Angles and Approaches

Discussant: Gerald Cha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New Zealand)

◎ *China-US Triangles: Roles and Impact of "Third Parties"*

Chair: Gerald Cha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New Zealand)

Tomoyuki Kojima (Dean, Faculty of Policy Management, Keio University of Japan), The China-US-Japan Triangle

Brian Bridges and Ren Yu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Ningnan University), Prawns and Whales: the Two Koreas and Sino-US Relations

Ian Storey (Deakin University), The China-US-Australia Triangle

Shih Chien-Yu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Central Asia and Sino-US Relations

Discussant: Herbert Ye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KBU)

◎ *China-US Interactions: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s*

Chair: Alexander Lukin (Russia)

Ming K. Chan (Hoover Research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Under the Shadow of Containment: Hong Kong in Cold War US-China Strategic Concerns

Cheng Wah Kwan (Mills College of USA), Arthur Smith, Missionary Knowledge and the Precondition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Sun Lung Kee (University of Memphis, USA), Chinese Asexuality and Polymorphous Perversity through American Eyes: Testimonies from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Roberto Antonio Noronha (University of Macau),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ino-American Foreign Policies

Discussant: Gilbert F. Ch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學界動向】

第二屆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報導

由香港歷史博物館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的「第二屆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已於2002年6月6日至7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舉行。開幕典禮由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致開幕辭、近代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黃媽梨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致歡迎辭；主題演講由李金強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持，講者及講題依次為：王家儉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講「閩系海軍歷史地位的再評估」、馬幼垣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與香港光復有關的兩個海軍問題」、戚其章教授（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講「甲午中日海上角逐與制海權問題」。

研討會分為九節，內容如下：

- 第一節 海防人物與思想（一）** 主持：丁新豹（香港歷史博物館）
 戚俊傑（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戚繼光兵學與中朝禦倭海戰的勝利」
 陳明光（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東南海防名將俞大猷研究述評」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第一個環遊地球的中國外交人員：張德彝對近代海防和西方船炮的認識」
 王如繪（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試論馬建忠的海防思想」
 評論：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
- 第二節 海防人物與思想（二）** 主持：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王記華（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試論李鴻章海防思想與海防實踐」
 麥勁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德國海軍對李鴻章早年海防思想的影響」
 林啟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孫中山海防建設思想概觀」
 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試論晚清客家籍外交官的海防思想」
 評論：鮑紹霖（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第三節 海防史料研究** 主持：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方駿、羅天佑（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王在晉《海防纂要》之研究」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清季海軍新史料——池仲祐及其《西行日記》」
 張偉國（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鴉片戰爭前中西古地圖描繪之珠江口戰略形勢」
 徐有威、周利敏（上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力行社之海防觀——以《中國日報》為個案的研究」 評論：
 余炎光（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
- 第四節 Navy, Diplomacy and the Asia-Pacific Chairman: Danny S.L. Paa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ing K. Chan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New Twist on Gunboat Diplomacy: Sino-British-American Discord over US Naval Presence in mid-1960s Hong Kong”
 James Stewart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Decline of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Power in the Far East”
 Edwin Pak-wah Leung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Seton Hall University),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Taiwan and the Ryukyu Controversy”
 David P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Delaware), “China’s First Telegraph Lines and the Defence of Taiwan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1874-1875”
 Comment: Gillian Bickley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第五節 海防策略與海軍建設（一）** 主持：馬幼垣（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馬楚堅（香港大學中文系）「明嘉萬間東南海防策略之轉變及其作用」
 郭偉川（泰國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所）「丁日昌之海防策略及其深遠的歷史影響」
 何耀光（軍事研究者）「對清末海防作為與國家現代化關係的認知建構——國家發展與體系理論的理解」
 葉國洪（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系）「清末海軍教育現代化的啟示：文化衝突、融和與調適——以福州船政學堂為例」
 評論：馬鼎盛（香港軍事時事評論員）
- 第六節 海防策略與海軍建設（二）** 主持：戚俊傑（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
 王宏斌（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鴉片戰爭後中國海防近代化建設遲滯原因探析」
 劉玉明（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正義之師何以敗北」
 馮青（日本女子大學大學院）「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朝海軍的中央集權化」
 吳守成（中華軍事學會）「偽滿洲國江防艦隊與江上軍」
 評論：曾瑞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第七節 民國時期的海防發展** 主持：朱益宜（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蘇小東（中國海軍航空工程學院）「一·二八淞滬抗戰後的聲討海軍風波」
 陳孝惇（中華軍事學會）「四零年代美國援華艦艇接收編組之研究」
 老冠祥（珠海書院新聞及大眾傳播系）「重慶艦事件與中英關係」
 評論：蘇維初（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 第八節 海事與中國近代社會** 主持：戚其章（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李木妙（香港新亞研究所）「海上絲路與澳葡的海外貿易發展，1513-1840」
 周子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二十世紀上半葉廈門經濟網絡之演進（1900-1937）」
 湯熙勇（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海難事件與海防安全：以清代處理外國籍海難船員為中心的探討」
 侯傑、秦方（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大沽炮臺：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天津海防的焦點」
 評論：馮錦榮（香港大學中文系）、李培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第九節 地區防衛 主持：黃文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陳正茂（光武技術學院）「中法戰爭與澎湖海防」

吳志華（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後門》與香港海防」

卜永堅（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前哨戰：1857年香港東涌之戰」

陳敬堂（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海上蛟龍——王錦」

黃國盛（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閩江沿岸炮臺與馬江之戰」

評論：龐百騰（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Delaware）、蕭國鍵（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

研討會最後由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陳明鈺博士作總結發言。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學界動向】

香港學界活動簡報

§民族主義的反思與挑戰論壇

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於2002年4月11日在該校大學中心會堂舉行「夢縈中國：民族主義的反思與挑戰」論壇，由余珍珠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系）主持，發言人有李澤厚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陳來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系）、張灝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系）、劉再復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四位。

§「移民與香港的歷史發展」講座

香港歷史博物館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第一屆校際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並於2002年10月至11月間舉辦一系列的專題講座作為配合活動，日期、講者及講題如下：（一）10月19日，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講「香港的華裔移民（1841-1951）」；（二）10月26日，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鄭德華博士講「內地移民與香港歷史」；（三）11月2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麥勁生博士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港的德國社群」；（四）11月9日，香港史研究者高添強先生講「從墳場看香港早期的外籍社群」；（五）11月16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冼玉儀博士講「同鄉組織與香港社會的發展」；（六）11月23日，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講師陳湛頤先生講「戰前居港日本人概況」；（七）11月30日，資深錄像藝術工作者馮美華女士講「歷史與錄像」。

§中國文化講座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合辦的「中國文化講座」，由2002年9月至11日間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共有七次，題目及講者包括：

- （一）9月14日，由梁元生（中大歷史系教授）、蘇基朗（中大歷史系系主任）講「教育改革，綜合人文科與歷史教育」；
- （二）10月19日，何萬貫（中大教育學院副教授）講「妙筆與神筆——網上寫作與學科知識測試的突破」；
- （三）11月2日，何培斌（中大建築系教授）講「匠心獨運——中國建築藝術」；
- （四）11月9日，鄭樹森（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人文學部教授）、譚國根（中大英文系教授）講「文學與翻譯」；
- （五）11月16日，莫家良（中大藝術系副教授）講「從傳統到現代——中國書畫藝術的變革」；
- （六）11月23日，蘇芳淑（中大藝術系系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講「中國文明的源流」；
- （七）11月30日，曾榮光（中大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蕭麗萍（羅定邦中學校長）講「望子成龍——DNA的延續與再生」。

§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

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2002年10月至12日間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共有八講，依次為：

- （一）10月5日，蕭國鍵教授講「張保仔：檔案文獻和掌故」；
- （二）10月12日，丁新豹博士講「移民與香港的建設和發展：1841-1951」；
- （三）10月13日，林天蔚教授講「香港文化與香港歷史新的剖析」；
- （四）11月3日，蔡志祥博士講「香港節日與地方社會」；

- (五) 11月10日，霍啟昌教授講「香港在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貢獻」；
- (六) 12月1日，梁炳華博士講「九龍城寨與中英外交」；
- (七) 12月14日，科大衛教授講「回顧六十年代：政治、文化與社會」；
- (八) 12月15日，「香港史研究座談會」（由本講座各位講者主持）。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